

古代政事杂记（三）

孙友道
编著

目 录

古址寻踪.....	1
黄帝的葬地桥山	1
楚国迁都至郢的时间	3
越国迁都琅琊	6
泰山封禅	9
夏墟位置	12
商汤的都城	15
古代曾国的位置	19
越国固陵城在何方	22
春秋时的“朱方”	25
“龙城”在哪里	28
古函谷关	30
姑苏台遗址	33
朝汉台	35
秦东门与秦桥今探	38
女真叶赫古城原址	41
闽越古都	44
夜郎古国	48
探踪古莱国	51
古庐子国	54
姑苏与吴国国都	57
楚国古都丹阳	60
南巢古国	63
秦都栎阳	66
苏州孙王墓	70
逸事趣闻.....	72

古址寻踪

黄帝的葬地桥山

《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崩，葬桥山。”桥山究竟在什么地方？

陕西省黄陵县城北一华里的桥山之颠有皇帝陵墓。197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陵为古墓葬第一号。但是根据《魏土记》的记载：“下洛城东南四十里有桥山，山下有温泉，泉上有祭堂，雕檐华宇被于浦上。”与此相同的还有《水经注》的记载。涿鹿桥山在今河北省涿鹿城东南四十里的温泉屯乡温泉屯村南，它以山顶上天然形成的一座拱形石桥而得名，海拔九百一十八米。晴天时，从桥孔望过去，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在桥山附近的一道山梁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四方石桌，传说是祭祀黄帝时在此摆设祭品的。石桌右侧有一峭壁，壁面平整，像一块巨大的石碑，上面布满与象形文字一样的图案，传说这是古人刻石记事而留下的遗迹。历史上，不仅桥山上建黄帝庙，桥山下的温泉上建有华丽的祭堂，在今温泉屯村西建有一座宜乡城，《水经注》卷三）城中筑有“温泉行宫”，专供历代帝王到桥山祭祀黄帝庙时居住。我国古代有许多帝王到桥山举行祭祀活动：

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于天兴三年（公元400年）五月，“幸涿鹿，遣使者以太牢祠帝尧、帝舜庙”。（《魏书》

卷二、《北史》卷一)同一年，远在建康(今南京)的东晋皇帝司马德宗，也为此而到涿鹿。神瑞二年(公元415年)六月，拓跋嗣“幸涿鹿，登桥山，观温泉，使使者以太牢祠黄帝庙”。(《魏书》卷三)同一年，同一月司马德宗又一次幸涿鹿登桥山。拓跋嗣又于泰常七年(公元422年)九月幸桥山，“遣使者祠黄帝、唐尧庙”。(同上)拓跋嗣死后，其长子拓跋焘即位，又到涿鹿登桥山祭祀黄帝庙。(《魏书》卷四)至于后来的北魏文成帝拓跋珪，睿到涿鹿登桥山的次数就更多了。

涿鹿与桥山有什么联系？现今的涿鹿是否史书所称的涿鹿？据《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西汉贾谊《新书·制不定》载：“黄帝行道，神农不德，故战于涿鹿之野”；北魏著名地理学家酈道元《水经注》载“涿水出涿鹿山，世谓之张公泉”，“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留其民于涿鹿之阿，即于是也，泉水东北流，与蚩尤泉会水出蚩尤城”。

这里还要说明一点，有的史书把“涿鹿”写成“浊鹿”。如南宋罗泌《路史·蚩尤传》载：“蚩尤好兵而喜乱，逐帝而居于浊鹿。”此处将“涿”写作“浊”，并非一时笔误，而是涿字演变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先秦典籍《逸周书》及后人对此书的批注中，就有“浊鹿”二字多次出现。如“蚩尤徙居于浊鹿，诸侯叛之，阪泉以亡”。清直隶宣化府保安州知州杨桂森在《矾山考记》中指出：“浊鹿即涿鹿。”当代研究古代神话的著名学者袁珂也肯定地指出：“浊鹿即涿鹿，今河北省涿鹿县。”特别是陈稚常编写、顾颉刚校订的《中国上古史演义》对此也作了有力的回答，该书第二回“千古文明开涿鹿”一篇中记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把蚩尤追杀在阪泉(在

今涿鹿县城东)”之后，黄帝“又召集各国，大会于釜山（今涿鹿县城西南）”。1983年春中国社会科学院以侯仁之教授为组长的一行十名学者赴涿鹿考查，确认涿鹿县的矾山镇一带正是司马迁、酈道元等人记载的“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所在地。1984年六月黄陵县考古学者高坤安等同志从河南、山东考查以后又专程到涿鹿县，证实史书中说的“涿鹿之野”就是此地。

综上所述，涿鹿是约定俗成的专用地名，正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的涿鹿。史书所称的“邑于涿鹿之阿”就是今涿鹿县矾山镇西侧古城又名黄帝城，此城遗址尚存。由此可见埋葬轩辕黄帝的陵墓，应是今河北省涿鹿县的桥山，而不是在陕西陵县城北。因为黄帝战斗在涿鹿，居住在涿鹿，死后，完全没有理由要将尸体运行到千里之外的陕西安葬。至于陕西黄陵到底缘何而得名，它是黄帝的衣冠陵，还是其他形式的陵墓，这就需要进一步的考证了。

楚国迁都至郢的时间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国最早的国都在丹阳，后来，因与其他小国争夺汉中之地，迁了一次都——从丹阳迁到了郢（今湖北江陵县境内）。关于这一点，史籍中记录得清清楚楚，不容置疑，后人无可争辩。问题在楚国到底何时从丹阳迁都至郢，人们争执不休，大概有四种说法。

一、迁于楚武王三十五年说。这是清人宋翔凤的观点，他在《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考》（见《过庭录》），一文中，引用成书颇早的《世本·居篇》中“楚鬻熊居

丹阳，武王徙郢”及杜预《春秋释例·氏族谱》中“楚国，……成王封熊绎于楚，……居丹阳。……武王居郢，今江陵是也”两段记载，证明楚国迁都是在武王之时，然后申述了下列理由：楚武王熊通大力向外开疆拓土，为了略取汉东诸国，并“据汉水之固”以御中原之师，将国都从丹阳(他主张丹阳是在丹、浙二水之间的河南淅川县境)南迁到郢。宋翔凤说，楚武王所攻伐的随国、郢国、绞国、罗国“诸国并在汉水之外，东北之地。是熊通之迁郢，然后得志于汉东”。根据楚武王伐随、伐郢的时间，宋断定迁都应在武王三十五年，也就是楚武王侵随、开始经营汉东之地之前。

二、迁于楚武王三十八年至四十二年初(前703年——前799年初)之间说。石泉在他的《楚都何时迁郢?》(《江汉论坛》1984年第4期)一文中，根据《左传·桓公十三年》、刘昭《读汉书补注》引《荆州记》及《水经注·沔水篇》的记载，推断出了上述结论。《左传·桓公十三年》说：“楚屈瑕伐罗，斗伯比送之。还，谓其御曰：‘莫敖必败！举止高，心不固矣！’遂见楚子曰：‘必济师’。楚子辞焉。……莫敖使徇于师曰：‘谏者有刑！’及郢，乱次以济，遂无次。及罗，罗与卢戎两军之，两败之。莫敖缢于荒谷，君帅囚于冶父，以听刑。楚子……皆免之。”

《荆州记》说：“(江陵)县东三里余，有三湖，湖东有水，名茭谷；又西北，有小城，名曰冶父。《左传》曰：‘群师囚于冶父。’县北十余里，有纪南城，楚王所都。”《水经注·沔水篇》说“……江陵城西北，有纪南城。……三湖合为一水，东通荒谷。荒谷东岸有冶父城，《春秋传》曰：‘莫敖缢于荒谷，群师囚于冶父’，谓此地也”。据此，石泉认为：这三段话表明，荒谷(茭谷)是水名，冶父城

在其东岸，两者均在纪南城附近，而纪南城为“楚王所都”。楚军败于罗后，屈瑕及属下回师楚都，停留在冶父城，听候楚王处分，屈瑕自杀，群帅得赦。充分地反映出了这时的楚都已在郢了，而这年为楚武王四十二年。楚都在丹阳的最迟证据是《左传》中记载的桓公九年楚、巴联兵伐邓之役，这年恰是楚武王三十八年。

三、迁于文王元年(前 789 年)说。这一说最早是由司马迁提出来的。《史记·楚世家》中说：“文王熊武立，始都郢。”《史记·十二诸侯表》周庄王八年的“楚”栏中又写道：楚文王“熊赀元年，始都郢。”后世持此说者不少。《汉书·地理志》南郡“江陵”县原注中就说：“故楚郢都，楚文王自丹阳徙此……。”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第 1 册中也说：“东周初期，楚愈益强大，前七〇四年，楚君熊通自号武王。熊通子文王熊赀迁都郢，有地千里。”只不过没有具体说是迁于文王元年罢了。

四、迁于楚武王五十一年武王崩，文王立之时。此说提出者为张正明，他在其《楚都辨》一文中说：虽然《左传·桓公十一年》(楚武王四十年)中有“郢人军于蒲骚，将与随、绞、州、蓼伐楚师”，屈瑕“次于郊郢”的记载，但这时的郢还只是楚人在几次伐随战役中开辟的根据地，尚非楚之国都。《左传·庄公四年》有楚武王五十一年，死于伐随军中，楚人与随人“为合于江内而还，济后而后发丧”的记载，发丧的地点当在郢或郊郢一带。文王此时继武王立后，就可能一直住在郢，没有回丹阳了，郢这才正式成了楚之国都。所以他说：“武王徙郢说和文王都郢之说可能是似异而实同的。”

综观以上各说，证据均取自信史，推理又有严密的逻辑联系，实难让人随便推倒。

看来，考证出楚国迁郢的时间，要费一番思量。

越国迁都琅琊

据史书记载，越王勾践在攻灭吴国以后，为了向北方发展，与中原诸国争霸，曾经把越国国都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迁到琅琊（今山东省胶南县南）。《越绝书·记地传》说：“勾践大霸称王，徙琅琊都也。”《吴越春秋·勾践伐吴外传》也说：越王“霸于关东，从琅琊起观台，周七里，以望东海”。《汉书·地理志》琅琊郡琅琊县注：“越王勾践尝治此，起馆台。”《山海经》郭璞注：“琅琊者，越王勾践入霸中国之所都。”《水经注·潍水》说得更清楚：“勾践并吴，欲霸中国，徙都琅琊。”上述这些著作或注解虽然众口一词，认定越王勾践有徙都琅琊之事，但此事疑点甚多，很可能是子虚乌有的误传。

第一，越国从会稽徙都琅琊，迁移的距离在千里以上，这在古代是一件罕见的大事；而且据《吴越春秋》记载，越国都琅琊，“历八主”，“积二百二十四年”。迁移的距离如此远，时间又这样久，可是在所有的先秦古籍，如《左传》、《国语》、《战国策》中，找不到一点关于此事的蛛丝马迹。西汉时，司马迁作《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历叙越国的兴亡始末，也毫不提及此事。直到东汉以后，关于越国迁都琅琊的记载，才逐渐见于史籍。这很使人怀疑，此事是东汉人附会出来的。

第二，琅琊从春秋末年至战国时期一直是齐国的领土。《孟子·梁惠王下》记齐景公说：“吾欲……遵海而南，放于琅琊。”赵岐注：“琅琊，齐东南境上邑也。”《晏子春秋》所述与此略同。足见齐景公时琅琊是齐邑，故

景公可自由来这里观游。《史记·田敬仲完世家》又载：齐平公五年(前 477 年)，齐卿田常“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封邑”，可知勾践灭吴的前三年，琅琊又为田氏所占，成了齐卿田常的领地。直到战国中期，有人向齐宣王游说道：“齐南有泰山，东有琅琊，西有清河，北有渤海，此所谓四塞之国也。”(《战国策·齐一》)此外，《汉书·地理志》也记：“齐地，……东有……琅琊。”这证明，琅琊在春秋战国间始终为齐国之地，越国不可能迁都于此。

第三，越国如何从齐国手中得到琅琊之地，来历不明，有没有可能吴国先夺取齐之琅琊，越国灭吴后就占有其地呢？据《春秋》、《左传》记载，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与齐交战仅有三次：一次在鲁哀公十年春，吴与鲁、邾、郯联系“伐齐南鄙”，因齐国发生内乱，不便进攻，只到齐国南部边邑就停止了。此后不久，吴王夫差又派徐承率领舟师“自海入齐”，结果大败而还。11 年 5 月，吴又与鲁伐齐，虽然大败齐军于艾陵(今山东省莱芜县东)，但吴国只俘获了一些将帅和战车，并未夺得土地，且很快就撤回回国了。至鲁哀公十三年，吴王夫差与晋、鲁诸国君会盟于黄池，越王勾践乘虚袭破吴都。吴国从此衰落下去，无力再于齐交战。可知吴国没有占领过琅琊。再说越王勾践在灭吴以前，不可能越过吴国，与齐争城夺地；在灭吴以后，越王勾践也只是“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并“以淮之地与楚，归吴所侵宋地与宋，与鲁泗东方百里”(《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越国这时既然把原来吴国淮北的土地分别给了楚、宋、鲁三国，当然更不可能跨过淮北去进攻齐国，从齐手中夺取琅琊。

由以上三点来看，越王勾践迁都琅琊很可能是无稽

之谈，在历史上是不曾有过的。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从越灭吴后的许多迹象考察，越国迁都琅琊确有其事。

一、越王勾践晚年的活动都在北方鲁、邾等国。《左传·哀公二十七年》记这一年春天，越王勾践以霸主的身分派大夫舌庸到鲁国来谈判，责备鲁国曾侵夺邾国土田一事，协定以眭上(今山东滕县东南)作为鲁、邾两国的分界，并设立边界的标志。同年二月，越国又使舌庸胁迫鲁国的季康子、叔孙文子、孟武伯三卿与鲁哀公一起在平阳(今山东邹县城)会盟。越使频繁地在鲁国周旋，显然是因为从琅琊来这里十分方便。到八月，鲁哀公遭三桓的进攻逃奔至卫国，又经邾国而转入越国。由于鲁君逃亡在外影响不好，这一年冬天，鲁“国人迎哀公复归”(《史记·鲁周公世家》)。鲁哀公因长期气恼、奔波，回国后就病死在鲁大夫有山氏家。这次鲁哀公出奔越都，鲁国人赴越都劝说，直至鲁哀公被迎归国，总共只用了二三个月的时间。鲁人不可能长途跋涉，远至南方千里之外的会稽，而只能往来于鲁国东边的琅琊。可见越国迁都琅琊，决非虚传。

二、勾践去世后，越国的活动中心仍在琅琊附近。

《墨子·非攻中》说：莒国(今山东省莒县)的东面，“越人夹削其壤地”，莒国因而“亡于齐、越之间”。很明显，越国是依靠建都琅琊的有利地形，不断攻夺其西边莒国的土地，莒国因受到齐、越的夹击而亡。《竹书纪年》又载：越王朱句三十四年(前415年)，越国“灭滕”(今山东省滕县西南)；次年，再“灭郯”(今山东省郯城县西南)，并俘虏了郯国国君鸛而归。到越王翳八年(前404年)，越国又攻灭缙国(今山东省枣庄市南)。《战国策·魏四》说：“齐和子之乱而越人亡缙”，就是指的此事。上

述这些，显然都是以琅琊为中心向西和西南进行的军事扩张。

三、过了若干年，越国又迁都南方。《竹书纪年》云：王翳三十三年(前 379 年)，越都“迁于吴”(今江苏省苏州市)。此时越国已见衰弱，无力在北方争雄，故把国都由琅琊南迁至吴，这也是很自然的。

琅琊一直是齐国之地，越国怎能迁都到别国的领土上？越国建都在千里之南的会稽，如何会长期在北方进行频繁的军事活动？越国迁都琅琊为什么从先秦到西汉的史书中一直没有记载？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问题更让人无法说清。

泰山封禅

泰山封禅是我国历史上封建帝王的一项极其隆重的政治活动，被定为国家大典。所谓泰山封禅，就是封泰山，禅梁父。“封”是在泰山顶上积土为坛祭天，以报天之功；“禅”原写作土单，是在泰山下的小山梁父(也写作梁甫)山上辟基祭地，以报地之功。这种盛典即叫封禅大典。

为什么历代帝王要选择泰山封禅呢？泰山海拔只有 1524 米，在五岳中不算太高，却被尊为“岱宗”、“五岳独尊”、“五岳之首”。其由来还必须从战国说起。战国时，齐人邹衍创立了阴阳五行学说。齐、鲁学者认为五岳中以泰山为最著名，东、西、南、北、中分别属木、金、火、水、土。东方属木，是日出的地方，被认为万物之始、阴阳昏晓交代之处。《风俗通义》说：“泰山之尊，一曰岱宗，岱，始也；宗，长也。……王者受命，

恒封禅云。”因而历代帝王都渴望到泰山封禅。

封建时代的这一神圣大典，并不是每代帝王都能举行的。《五经通义》说：“易姓而王，致太平，必封泰山，……告太平于天，报群神之功。”周文王、周武王虽然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帝王，但文王时政不及泰山，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得安宁而崩，他们都没有能到泰山封禅。齐桓公会诸侯于葵丘，而欲封禅，管仲曾加以劝阻。齐桓公只是一个霸主，不是受命于天的天下共主，不能封禅。季孙氏是鲁国专权的陪臣，更无资格去礼拜名山。可是季孙氏竟然跑去祭祀泰山，孔子曾讥讽季孙氏旅于泰山，认为纯属僭越行为。举行泰山封禅大典是被视为国家兴盛、政权稳固的标志，因而成为历代帝王狂热追求的目标。泰山封禅的皇帝，可以以“奉天承运”的真龙天子自居，可以此粉饰太平，安定人心，欺骗人民。

关于泰山封禅起于何时，历史上存有几种说法：

一、起于伏羲以前的无怀氏或无怀氏以前很久的时代。《管子·封禅篇》记载：管仲曾向齐醒公叙述了自古以来，封禅的帝王有 72 家。他能说出姓名的只有 12 家，即无怀氏、伏羲、神农、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山（在今蒙阴县东北）。黄帝封泰山、禅亭亭山（在今泰安市西南）。颛顼、帝喾、尧、舜封泰山、禅云云山。禹封泰山、禅会稽山（在今浙江绍兴）。汤封泰山、禅云云山。周成王封泰山、禅社首山（在今泰山之南）。这 12 家帝王，以无怀氏为最早。

《尚书序疏》说，上古时代封泰山、禅梁父者万余人，仲尼看了不能尽识。管仲对齐桓公说，古之封泰山者 72 家，我管夷吾所识仅 12 家而已。上古登封者皆“刻石纪号”，远者字有损毁，故不可识。管仲所不识者 70

余家，又在无怀氏前。孔子观而不识者又多于管仲。

从《尚书序疏》的记载中可以看到：古代帝王封禅开始于无怀氏以前很久很久的年代。那些部落酋长登泰山祭祀，都“刻石纪号”到管仲、孔子时代，即有许多无法辨认了。

二、从黄帝开始。《韩非子·十过篇》记载，黄帝大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韩非所记载的鬼神，实际是当时各部落的酋长们。《史记·五帝纪》记载：黄帝时，“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就是说，黄帝时天下太平，在自古以来的帝王中，唯有黄帝登泰山封禅祭祀山川鬼神为最多。据《史记·封禅书》记载：汉武帝时，济南人公玉带曾向皇帝献皇帝时明堂图。汉武帝根据公玉带所献之图，在汶上建筑明堂。这是说，黄帝在泰山封禅即建筑了明堂。

三、从舜开始。《尚书》是我国最古老的一部公文汇编史书。《尚书·舜典》记载：“岁二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礼记·王制》也作了相同的记载。司马迁虽然也引证了管仲对齐桓公讲述无怀氏等封泰山的事，但《史记》中记载古代帝王封禅活动，却是从舜开始写起。

四、从秦、汉开始。隋代王通对传统的自古帝王都封禅的说法提出质疑。他明确地说：封禅非古制，实从秦始皇、汉武帝开始。清代马端临赞同王通的说法。马端临指出：无怀氏至三代即封禅的说法，“盖出齐、鲁陋儒之说，《诗》、《书》所不载，非事实也。”秦始皇、汉武帝登泰山封禅，《史记》、《汉书》都有详细记载，不仅在秦始皇、汉武帝本纪里有记叙，在《封禅书》、《郊祀志》里都作专门记叙，可以作为信史不疑。

秦始皇到泰山封禅，礼仪都是采自秦国祭上帝时所用的那一套仪式。不让儒生们参加，他们怨恨秦始皇。恰好秦始皇走到半山腰遇上了大风雨，在松树下躲雨，儒生们讥笑秦始皇犯了天怒。

汉武帝到泰山封禅，祭祀时，把各国进贡的奇兽珍禽放了满山，好像真的来了麒麟凤凰一样，还下诏把这一年改为元封元年。

夏墟位置

对夏文化的认识，一直是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所研究的重大课题，多年来一直是一个未解的悬案。这个显赫 14 代 17 王，近五个世纪之久的奴隶制王国，既有文献记载，又有人间传说，难道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痕迹吗？自禹至桀的漫长岁月里，其都城建在何处，考古界正努力去寻找，研究者力图把文献记载与考古发掘相结合找出正确的答案。

解决夏墟问题，必须要先解决夏文化问题，在解决夏文化问题之前，首先还要了解清楚夏人活动的范围。

根据文献记载推测，夏人活动的大体范围，西起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的地方，南接湖北，北入河北，夏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地区，看来夏文化曾显赫在中原历史舞台上无疑。

文献中有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城”的说法。《孟子·万章上》：“禹居阳城。”《世本·居篇》：“禹都阳城。”（《汉书·地理志注》颍川郡阳翟县下引）“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史

记·夏本纪》：“禹辞避舜之了商均于阳城。”

另外，文献中也较多的记载着“禹居阳翟”的说法《史记·周本纪·集解》引徐广曰：“夏居河南，初在阳城，后居阳翟。”《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王世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

《元和郡县图志》卷五河南府阳翟县条：“阳翟县本夏禹所都，春秋时郑之栋邑，韩自宜阳移都于此。”又据《史记·封禅书》《正义》引《世本》云：“夏禹都阳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史记·孙子吴起列传》：“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修政不仁，汤放之”。

看来，夏禹所都大体上不会超出以上范围，但是史书上所载地名，与现实地名出入甚大，后人说法纷纭。例如阳城，一说在颍川郡阳翟县（今河南禹县）；一说在嵩山南（今河南登封县）；一说阳城就是唐城（今山西翼城县西）；一说阳城在泽州（今山西晋城）；另外还有阳城在大梁（今河南开封）的说法等等。

《国语·周语》，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有《禹居阳城考》，论述甚详。近年来，在属于阳城地望的河南登封境内，发现了我国目前最早的城堡之一——王城岗城堡遗址。但是，要确定一处京都，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只有确立了夏文化，才能集中到探索夏都的范围上来。

早在 40 年代，有人认为仰韶文化是夏文化，也有人认为龙山文化是夏文化。只因当时积累的考古资料有限，研究者只能做一般的推测。自 1959 年进行的“夏墟”调查，才正式展开了对夏文化的探讨工作，进一步把夏王朝的疆域集中到河南境内的豫中、豫西，山西境内的汾

河中下游，特别是汾、浍、涑以及沁、丹水流域。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学者们也做了大胆的探讨，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一二期为夏文化遗存；有人单独把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列为夏文化遗存；还有人把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列为夏文化遗存。

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不少人认为所谓“禹居阳城”与今日王城岗有一定的关系。《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河南日报》以及其他刊物先后报导了王城岗遗址的情况，并认为王城岗遗址是夏代的重要地址。

文献记载中禹与阳城的关系是密切的，而王城岗遗址所在地理位置与文献记载中的夏都阳城的地位其本吻合，但是，一个文化的确立，特别是一处奴隶制王国都城的确立，都应具有令人信服的材料。夏鼐先生认为，关于夏都问题，“一般的探讨过程中，是先确定遗址属于某一王朝，然后再确定它是该王朝的京都”。又说，“如果这遗址属于是夏文化，也仍有是否有都城的问题”；所以，这里首先要解决的是夏文化问题”，一旦夏文化解决了，夏墟之谜也就不难而破了。

根据文献记载来看，夏朝的都城与商朝一样，曾多次迁徙，但可以看出，夏朝的都城始终围绕着以河南西北部和山西西南部这两个中心。前者可详见清代洪颐煊《筠轩文钞》的《禹都阳城考》，后者史书中也有较多记载，《左传》定公四年杜预注：“夏墟，大夏，今太原晋阳也”。定公四年，“命以《唐诰》，而封于夏墟”。由此而产生了夏墟位“晋中太原”说和“晋西南”说。由于史书中对夏墟地望的记载比较分散，传说较多，而且夏文化遗址的分布也较普遍，故缺乏足够的材料加以论定。

应该提及的是，夏王朝活动的中心和夏王朝统治的区域应该轻重分开，在探索夏墟问题上，应该从大范围集中到中心方面来。不管禹居阳城，或阳翟，或安邑，或晋阳，当然都是有可能的，但是，被禹所居过的地方，不一定是夏朝的都城，另外，夏王朝是否在此建都，还应与有无大型或典型夏文化遗址的材料相印证。

综上所述，探索夏墟问题，只能在夏代活动的地域范围内，根据文献记载，结合考古发现，充分认识夏文化的渊源，了解它的社会发展阶段，掌握地域的分布范围和时间的断代；进行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这个问题就可以顺利得到解决。

商汤的都城

汤是商朝的第一个帝王，他的所居地叫“亳”，是商朝初年的首都。关于“汤居亳”的史料，在《史记》、《尚书》、《战国策》、《逸周书》、《孟子》、《墨子》、《荀子》等文献中均有记载。因“亳”与“薄”古音相同，可以通假，故“亳”又作“薄”。但古地名中称“亳”者甚多，汤所都之“亳”究竟在什么地方呢？

第一说是“杜亳”。《史记·六国年表》：“夫作事者必于东南，收功实者常于西北。故禹兴于西羌，汤起于亳。”《集解》引徐广说：“京兆杜县有亳亭。”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则明确地说：“亳，京兆杜陵亭也。”其今地在陕西长安县。清人俞正燮也力主此说。但钱大昕不同意杜陵之“亳”是商汤的首都。他提出，“京兆之亳，乃戎王号汤者之邑；而徐广以殷汤所起，其不然乎？”所以此说近来已没什么人坚持。